
中澳建交之前两国民间往来初析

——以 1949—1965 年间来沪的澳方人士为例

谢晓啸

【摘要】 1972 年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建交前,双方虽然在官方层面的接触极少,但民间的往来却并未完全中断。在此期间,少数澳大利亚的有识之士曾经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华访问,并在促进双方民间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扮演了重要但尚未获得学界充分重视的“桥梁”角色。本文聚焦 1949—1965 年间来沪的澳方人士,初步揭示两国建交前民间交往的大致概况。整体而言,无论从来访人员的规模数量还是其访华目的来看,1956 年都是中澳民间交流的一个分水岭,其后造访申城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人数更多、身份背景也更为复杂多样。造成这一变化的三大因素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紧张局势的短暂缓和、澳大利亚政商两界在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及澳中协会对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有力推动。

【关键词】 澳中关系;民间往来;访华人士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21)03-0157-11

【作者简介】 谢晓啸,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全球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200444

自 1949 年 12 月澳大利亚自由党领袖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赢得大选上台至 1972 年中澳建交前,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始终对中国抱有一种敌视和戒备的心态,双方在官方层面上极少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在民间层面,两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尽管同样十分有限,却并未完全中断。两国建交之前,仍有一定数量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陆续来华访问。在返回澳大利亚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进行积极正面的宣传,并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在现有的关于中澳建交前两国关系的论述中,却鲜见对这一段民间交流历史的深度探讨。^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澳大利亚并未追随其传统盟友英国的步伐,而是采取了与美国相近的立场,拒绝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对华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其后,由于中澳两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 1971 年时任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的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率团访华,澳中关系才迎来转机。在 1972 年 12 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之后,惠特拉姆很快兑现了其在前一年访华时许下的承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旋即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交。关于中澳建交前两国的关系、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以及影响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等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相对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9—172 页;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0—99 页;张祖兴、喻伟《建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知》,喻常森主编《中澳关系的历史经验及发展现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7 页;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2, chap. 2; 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1949: The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PRC,”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3 (1985) pp. 29—50; 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Carlton,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op. 6, 7; 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part 1; Gordon Greenwood, *Approaches to Asia: Australian Postwar Policies and Attitudes*, Sydney: McGraw-Hill, 1974, chap. 6; David Walker, *Stranded Nation: White Australia in an Asian Region*, Crawley, WA: UWA Publishing, 2019, chap. 10.

国内学者中,侯敏跃曾就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国内民众赴华旅行的立场变化做过分析。^①西方学者中较早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外交流的是赫尔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②近年来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如拉克兰·斯特拉恩(Lachlan Strahan)、提摩西·肯德尔(Timothy Kendall)和阿格涅斯卡索·博辛斯卡(Agnieszka Sobocinska)、乔恩·皮西尼(Jon Piccini)等则是将考察重点放在这些访华人士对中国的认知之上,他们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这些访华人士究竟缘何对中国产生兴趣?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和认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受何种因素的影响,是否确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③换言之,斯特拉恩等一批新生代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史料钩沉,而是希望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影响访华人士对中国认知的心理和结构性因素。但在笔者看来,这类研究的史实基础并不稳固。帕辛的著作集中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56年之后来华的部分澳大利亚民间人士的情况,但对1960年代澳中两国的人员往来却几乎未置一词。肯德尔和博辛斯卡等学者的研究则主要是其中访华人士公开或未公开出版的游记或者日记等材料,而没有运用相关的中英文档案,因此他们的著作并未能呈现出这一时期来访的澳大利亚人员的全貌。另外,笔者想强调的是,尽管对这些早期澳大利亚访华人士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或许的确有助于我们一窥当时澳大利亚部分民众是如何看待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但揭示这些“先行者”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公众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同样也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潜在研究课题。

正如拉克兰·斯特拉恩所云“在探讨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时,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的著作大多是聚焦于外交政策的演变,忽视或者是低估了关乎本土文化(national culture)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相反,它们更多地是致力于阐明一些官僚—政治精英的决策……但决策者并非是在一个真空环境或者在一种超然孤立的状态下行使自身的职责的……他们受到了阶级、性别和组织地位的影响,并会听取学校、游说团体、教会、协会、工会和工作场所的意见。”^④澳大利亚政府在制定相关对华政策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包括众多访华人士在内的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影响。因此,历史学家在探究1972年中澳建交的前因后果之时,无疑应当对这些早期澳大利亚访华人士在促进两国人民彼此认识、加强双方交流以及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对曾在1949—1972年期间访问过中国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逐一核实其身份背景信息,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早在1965年,美国学者亨利·阿尔宾斯基(Henry Albinski)就曾感慨,

① 侯敏跃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澳政府并不鼓励甚至在某些时候严禁本国国民访华,如1952年澳政府就宣布不向希望参加同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人士发放护照;1954年,其又再次采取限制性措施,使得许多澳方人士无法顺利来华访问。作者认为,上述两次明显的干预分别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苏联驻澳使馆秘书彼得罗夫突然寻求政治避难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随着国际局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澳政府在本国国民访华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见侯敏跃《中澳关系史》,第167—169页。

② 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的文化外交》(*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中,帕辛曾专辟一章介绍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中国的民间交往的情况。他指出,相比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来华人员的数量明显更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中国议题”始终是澳大利亚国内政治辩论的一个焦点,特别是在1955年澳工党分裂之后,后者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与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Liberal-Country Coalition)相反的立场,开始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其主要的对外政策之一。其次,澳大利亚共产党相较于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澳大利亚国内的舆论。其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逐渐形成了一种对自身地区定位的潜在认知,即其作为一个地处亚洲的“白人”国家,必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正是受这样一种认知的影响,才使得澳大利亚对中国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此外,帕辛还将这一时期来访中国的澳方人士按照身份背景分为“学术交流”、“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教会代表团”和“政治访问”四类。Herbert Passin,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ger, Inc, Public, 1962, pp. 54—55, 58—71.

③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81—204; Timothy Kendall “Marco Polo, Oriental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Australian Travel accounts of Mao's Republic,”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8, no. 4 (2004), pp. 373—389; Agnieszka Sobocinska “Australian Fellow-travellers to China: Devotion and Decei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 32, no. 3 (2008), pp. 323—334; Jon Piccini “‘Light from the East’: Travel to China and Australian Activism in the ‘Long Sixties’,” *The Sixties: A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6, no. 1 (2013), pp. 25—44.

④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p. 2.

基于他所掌握的材料,只能对在此之前访问过中国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的人数进行一个大概的估计,而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①阿尔宾斯基遭遇的困境至今仍存在,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面对中澳建交前两国民间具体开展过哪些形式的交流和互动,是否存在高峰和低谷,又有哪些潜在因素影响了双方在不同时期往来的频繁和密切程度等一系列问题,更多只能依赖推测和假设,而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确切答案。

为填补这一现有研究的空白,本文将以1949—1965年期间到访过上海的澳方人士为例,力图通过史料的爬梳,进一步揭示影响中澳建交前双方民间交往的因素。^②本文之所以选择访问上海的澳方人士作为考察对象,并且聚焦于这一时间段,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考量:首先就地点而言,申城在当时既是全国的工商业经济中心,又是少数最早对外宾开放和绝大多数西方人士在华期间都会到访的城市之一,因此,通过对来沪的澳大利亚人士进行重点考察,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③其次,就时间段的选择而言,笔者通过梳理现已掌握的材料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17年时间里,不但来访的澳方人士数量上总体呈现一种递增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些民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客观上为之后两国建交创造了条件。然而,自此之后直至70年代初澳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来华,双方的民间交流虽未完全中断,但其频繁和密切程度却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时也未能对促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本文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广泛运用中澳两国相关公开档案文献、中英文报纸、杂志、回忆录等材料。^④文章主体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小节首先简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造访申城的澳方人士的基本概况,并结合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澳大利亚政界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对这一时期双方民间交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第二小节聚焦于在1956年之后来访的澳各界人士,并对当时经由澳民间和半官方人士的友好访问打开的对华贸易(特别是小麦贸易)的新渠道以及澳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做重点考察。最后一节对这一时期澳中民间交流的特点进行归纳,并从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澳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态度立场和民间组织的活动这三个层面剖析1956年之后两国民间往来逐渐升温的原因。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来访的澳方人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正值以美苏主导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逐渐由欧洲扩大到亚洲之时。在冷战的阴云笼罩之下,当时仍在执政的澳工党政府基于可能的选情变化和美国的反应等多种政治因素,并没有选择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之后赢得大选上台的澳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Liberal-Country Coalition)政府则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明确了其不与中国建交的敌对立场。^⑤

但是由冷战所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澳工党和自由党-国家党两届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相继采取的暧昧和强硬的立场,并未妨碍一小部分左派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士试图以访华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如澳大利亚海员工会(Seamen's Union)书记艾略特·埃利奥特(Eliot V. Elliott)就曾尝试于1949年11月赴北京参加亚澳工会会议,1950年7月,尤里加青年团(Eureka Youth League)悉尼分会的书记瓦尔特·斯坦利·坎宁安(Walter Stanley Cunningham)同样欲以世界

^①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55.

^② 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一,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不同时期来沪的澳方民间人士的身份背景和访问事由的区别,因此并未逐一列举所有的来访人员;其次,基于同一原因,本文也未备录同一时期以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身份来华的人士。

^③ 关于这一时期上海的工商业发展状况及其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参见熊月之《上海五六十年代创造的奇迹》,《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9日,第8版。

^④ 由于中澳双方对相关来访人士信息的记录各有侧重之处,如中文史料常常只提及来访者的中文译名,而英文史料则不一定能明确说明其是否到过上海,因此,下文尽可能地采用了多种不同来源的文献材料进行相互参照和印证,以求能够提高准确性和可信度。

^⑤ 关于当时澳工党政府是否承认中国这一问题上立场的波动及其原因,参见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1949: The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PRC,"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3 (1985) pp.29—50。

民主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代表的身份来华访问。^①但由于各种原因,两人最终都没能抵达中国。目前已知首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华的澳大利亚人士应是欧内斯特·桑顿(Ernest Thornton)。^②桑顿在卸任澳铁匠工会书记(1936—1949)一职后,于1950年7月奔赴北京,之后三年以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委员的身份在华工作。^③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桑顿之后第一个来华并造访过申城的澳方人士是诺尔·艾贝尔斯(Noel Ebbels),他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一员的身份,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邀请,于1950年9月访问中国。艾贝尔斯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参观走访了我国东北地区以及大连、天津、北京等城市之后,于10月4日抵达上海进行访问。^④作为前澳大利亚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书记和时任国际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执委,艾贝尔斯在华期间不但多次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发言声援中国的和平事业,还接受过《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并撰写了一篇题为《光荣的中国学生运动》的文章。^⑤在该文中,艾贝尔斯分享了他在上海、沈阳、南京、南昌、北京等城市与当地学生交流的感悟,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学生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予以高度评价。^⑥

上文之所以着重介绍艾贝尔斯的身份背景及其来访事由,除了考虑到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造访申城且有据可查的澳大利亚人士之外,还因为他以澳青年领袖的身份访华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他之后,还有一些澳大利亚青年曾经来沪参观访问,如1951年和1953年,就有两支澳大利亚青年代表团陆续访沪(这两支代表团分别参加了在柏林和布加勒斯特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后来华)。^⑦与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来访的许多澳方人士不同,上述青年代表/团不是从本国出发经香港入境,而是从欧洲出发乘火车或者飞机经莫斯科抵达中国的。造成这一不同时期在来华途径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对外交流渠道的变化。尼科莱·沃兰(Nicolai Volland)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因此参加由苏联主导的各类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便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主要形式。^⑧这一特点亦决定了许多早期的西方访华人士都是经苏联或者东欧抵达中国的。

① “U. S. Consulate Refuses Visa to E. V. Elliott,” *Canberra Times*, 19 April, 1950. “Red Sets Chinese Puzzle,” *Daily Telegraph*, 28 November, 1949. “Communist Refused Visa for Trip,” *West Australian*, 22 July 1950. 关于召开亚澳工会会议的前因后果,可参见刘宁一:《关于召开亚澳工会会议》,刘宁一著,吴学林编《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4页。据刘文,澳大利亚方面的代表似乎在当时也到京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其并未明言究竟是哪位澳方人士于何时、通过何种途径来京参会。笔者也未能确认来访者的身份背景信息。

②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宾斯基在其书中提到,日后成为著名澳汉学家的费子智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经香港入境,赴北京处理一些私人事务。费子智本人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他曾于1949年7月应邀赴澳做巡回学术演讲,随后在同年12月返回北京,于次年离开中国赴澳任教。考虑到费子智在离华前的身份仍是英国驻中国顾问团中的一员,因此笔者认为,严格来说,并不能将其视作是首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访的澳方人士。见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26, 64; C. P. FitzGerald, *Why China?: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923—1950*, Carlton,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8—229, 241—242.

③ “Thornton Leaves Ironworkers,” *Singleton Argus*, 14 July 1950.

④ 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第228—229页。

⑤ 《世界青联代表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 各国代表分别出席京市演讲会》,《人民日报》1950年9月29日,第1版;《全世界学生为和平而斗争——访国际学联代表艾贝尔斯》,《人民日报》1950年9月25日,第5版;《澳大利亚青年为反对孟席斯反动政府而斗争 澳大利亚青年代表艾贝尔斯访问记》,《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第4版。关于艾贝尔斯的生平简介,另可参见“*Noel Ebbels' Tragic Death in Accident*,” *Tribune*, 13 February 1952.

⑥ 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在中国》,第65—68页。

⑦ 《青年团上海市委为接待澳大利亚、锡兰等六国青年代表团的请示报告、总结等》,1951年11月3日,C21-2-449,上海市档案馆藏;《华东和上海市外宾招待委员会关于接待外宾方面的有关材料》,1952年1月,B1-2-3663,上海市档案馆藏;“*A Letter from China*,” *Tribune*, 09 February 1955.

⑧ Nicolai Volland “*Translating the Socialist State: Cultural Exchang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ist World in the Early PRC*,”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33, no. 2 (2008), pp. 51—72.

除了青年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到访过上海的澳大利亚人中,以代表团成员身份来访的和平运动人士占据较大比重,其中包括众多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访者,如应邀出席1952年于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出席195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来访的澳大利亚代表团等。^①

总的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来访的澳方人士数量极为有限,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持亲中立场的左翼人士。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受冷战的影响,政治氛围日益紧张,迫使许多人放弃了来中国访问的想法。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澳政府不但对国内的左翼人士多有弹压之举(如孟席斯政府就曾尝试取缔澳大利亚共产党),同时实行十分严苛的护照政策,这使得绝大多数有意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人最终都未能实现访华的夙愿。

随着国际局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始出现短暂缓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得以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重新开展有限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②作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澳大利亚对于这一国际风向的变化是极其敏感的。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澳政府在本国国民访华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开始逐渐软化,为澳中民间交流幅度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1956年之后来访的澳方人士

斯大林在1953年的突然逝世,使得冷战初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抗的紧张局势开始产生变化,而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时所展现出的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超外交手腕,则一举赢得了包括西方各国在内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是在这一中国的外部环境逐渐得到改善的大背景之下,澳中两国民间交流也呈现日渐扩大的趋势。

同样以访问上海的澳大利亚人士为例,自1956年起至1965年,申城接待过的来访者相较于之前人数更多、背景也更为复杂多样,涵盖了包括工会、商贸、文教等在内的澳各界人士。首先,1956年之后,两国工会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交流愈发频繁和密切。1957年和1961年,澳工会理事会分别派出两支由其主席A.蒙克(A. Monk)和第二副主席W. P.埃文斯(W. P. Evans)率领的代表团来华考察并访问上海;1963年,另一支由澳大利亚建筑劳工工会维多利亚州分会主席亨利·达纳赫(Henry Danaher)率领的澳建筑工会代表团也曾来沪参观考察。^③此外,一些澳大利亚工会的领袖也曾在访华期间以个人名义来沪,如1959年和1962年来访的澳大利亚锅炉总会(Boilermakers' Soci-

^① 关于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团的情况可参见代表团成员之一海伦·帕尔默(Helen Palmer)撰写的《澳大利亚教师在中国》。Helen G. Palmer, *Australian Teacher in China*, Sydney: Teachers' Sponsoring Committee, 1953. 关于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来访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参见《华东暨上海外宾招待委员会关于招待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澳大利亚、缅甸、阿根廷、印尼等四国和平代表的总结报告》,1953年,B1-2-3663-27,上海市档案馆藏。另可参见该团代表之一伊丽莎白·瓦西列夫(Elizabeth Vassilieff)撰写的《北京莫斯科来信》。Elizabeth Vassilieff, *Peking Moscow Letters: About a Four-Months' Journey, to and from Vienna, by Way of Peopl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Melbourne: Australasian Book Society, 1953.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欧几大主要国家的民间交往,可参见《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于2016年刊发的相关主题的一期专辑的导言。Angela Romano and Valeria Zanier, "Circumventing The Cold War: The Parallel Diplomacy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Western Europe and Socialist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 Introduc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1 (2016); pp. 1—16.

^③ 1957年访华的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副主席肯尼曾在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致辞,他在讲话中提到,蒙克在结束他的访华之行返澳后,曾发表过一个声明,其中提到他曾到过上海。参见《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副主席肯尼致词》,人民日报1957年12月7日,第3版。关于文中提到的其他来访人员,参见《外国工会代表团离我国》,《人民日报》1961年5月24日,第4版。《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待1961年“五一”各国工会代表团的总计划、名单、行程、小结等文件》,1961年4月,C1-2-3664,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市总工会接待1963年国庆期间各国工会代表团的计划、外宾名单》,1963年9月,C1-2-4366,上海市档案馆藏。

ety) 总书记 A. 布克莱 (A. Buckley)^①、1960 年来访的澳大利亚建筑工人产业工会 (Building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 总书记弗兰克·伯尔斯 (Frank Purse)^② 和 1961 年来访的澳大利亚铁匠工会 (Blacksmiths' Union) 总书记乔治·阿特金斯 (George Atkins) 等。^③ 受本文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此处不便就此一时期澳中两国工会往来做进一步的延伸讨论, 但澳方工会代表团的密集来访, 无疑为之后中国的工会代表团访澳创造了有利条件。1960 年 10 月, 一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率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就曾应邀访问澳大利亚。^④

还有一类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之后频频来沪访问的人员是澳大利亚的妇女代表, 例如曾在 1958 年访沪期间受到宋庆龄接见的澳妇女代表团以及次年来访的前澳大利亚妇联 (Union of Australian Women) 全国委员会主席薇娜·巴顿 (Vena Burton) 等。^⑤ 此外, 1956 年来华的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丁夫娜·库沙克 (Dymphna Cusack) 也曾经造访上海, 并采访了上海某位民族资本家的妻女。在库萨克《中国妇女发声》(Chinese Women Speak) 一书中, 她曾对自己与众多不同身份背景的中国妇女交流的经历进行过细致的描述。^⑥

在这一时期访问过上海的澳大利亚的文化界人士亦不在少数, 申城曾接待过由知名汉学家费子智 (C·P·Fitzgerlad) 领衔, 于 1956 年访华的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 1962 年访华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戈登·安德鲁·汤普森 (Godern Andrew Thompson)、1963 年来华的澳大利亚著名诗人和音乐家约翰·斯特里特·马尼福尔德 (John Streeter Manifold), 以及应中国科学院邀请, 于 1964 年来访的一支高规格的科学代表团, 其中包括担任团长的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 T. M. 切里 (T. M. Cherry) 和曾经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澳著名核物理学家马克·奥利芬特 (Mark Oliphant) 等。^⑦ 以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会长杰弗里·纽曼-莫里斯 (Geoffrey Newman-Morris) 为首的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代表团也曾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于 1964 年来华, 并访问过上海。^⑧ 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来访的澳方文化科学界人士在返澳后, 都自发地成为了向当地公众宣传中国的“使者”, 由此激发了更多人对中国的兴趣。例如澳大利亚著名企业家肯尼斯·迈尔 (Kenneth Myer) 就曾在先前访华的伦纳德·考克斯 (Lenoard Cox) 医生的影响下, 萌生了赴中国旅行的想法。^⑨ 迈尔本人最终于 1958 年来华, 并在乘坐火车去往北京的旅途之中, 在上海、杭州等地停留数日游览观光。^⑩ 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促使其在返澳后慷慨解囊资助墨尔本大学筹建东方学系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⑪ 但迈尔与中国的联系并不止于此, 在中澳建交后的 1973 年, 他

① “T. U. Leaders at Overseas Meetings,” *Tribune*, 13 May 1959. 《上海市总工会关于接待澳大利亚五金工会联合会代表总书记布克莱及夫人的计划、日程、情况汇报等文件》, 1962 年 7 月, C1-2-3819,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Newcastle Forms Aust. - China Body,” *Tribune*, 24 August 1960. “Apology for Radio Slander,” *Tribune*, 27 April 1960. 《上海市总工会联络部关于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议代表名单 (澳大利亚、奥地利)》, 1960 年 6 月, C1-2-3468-27,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 “Condemn Cold War Anti-Chinese Lies of Army and S. M. Herald,” *Tribune*, 31 August 1960.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接待澳大利亚铁匠工会总书记阿特金斯的计划、日程、情况汇报等文件》, 1960 年 12 月, C1-2-3641,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Herbert Passin,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p. 69.

⑤ 《澳大利亚巴顿夫妇离广州回国》, 《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16 日, 第 4 版 “All over the World, Women Prepare a Celebration,” *Tribune*, 17 February 1960.

⑥ Dymphna Cusack, *Chinese Women Speak*,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1985, pp. 92—103.

⑦ 《我科学院副院长欢宴澳大利亚科学代表团》, 《人民日报》1964 年 9 月 24 日, 第 4 版 “Scientists to Visit China,” *Canberra Times*, 22 July 1964. 另外, 奥利芬特本人亦曾撰文一篇介绍其在华时的见闻。参见 Mark Oliphant, “Over Pots of Tea: Excerpts from a Diary of a Visit to China,”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2, no. 5 (1966).

⑧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代表团到京》, 《人民日报》1965 年 10 月 27 日, 第 4 版 “Red Cross Head Back China Leads Australia in Some Areas,” *Canberra Times*, 4 November 1965.

⑨ 考克斯是 1956 年访华的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1957 年他以澳大利亚医务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再度访华。 “Doctors Reach Red China,” *Canberra Times*, 25 April 1957.

⑩ Sue Ebury, *The Many Lives of Kenneth Myer*, pp. 286—287.

⑪ Sue Ebury, *The Many Lives of Kenneth Myer*, pp. 285, 290—292.

曾受命参加了由时任澳大利亚副总理兼海外贸易部长吉姆·凯恩斯(Jim Cairns) 领衔的政府贸易代表团再次访华。^①

1949 年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尽管始终拒绝与中国建交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但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的缓和,其一度默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国内一些(半)官方的机构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和商务联系之中。例如,1956 年澳大利亚驻香港的商务专员同时也是罗伯特·孟席斯的堂弟 H. C. 孟席斯(H. C. Menzies),在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同意(罗伯特·孟席斯明确表示不反对其堂弟出访中国)之后,就曾应中国进出口公司的邀请乘火车赴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在华期间,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方相关人士都曾会见过他,并与其就扩大两国贸易往来等问题交换过意见。^② 同年,澳大利亚派驻菲律宾大使基斯·尚恩(Keith Shann)曾在赴日本途中在青岛和上海短暂停留,并在之后向堪培拉方面报告过其对上海市容市况的观察。^③ 1958 年 12 月造访上海的澳大利亚贸易游轮“德洛斯”号(Delos)是另一个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立场的例子。对于该船的行程,澳大利亚政府不但事先知情,甚至通过其驻香港的商务专员提前知会中方,并就相关接待事宜进行了协商。^④ 根据中方档案材料显示,这艘由澳大利亚出口商协会组织的贸易游轮在抵沪前,曾先行在香港靠港停留,并与华润公司进行接触,请求华润向上海方面通报其希望访华的意愿,以便后者提前做相关安排。^⑤ 这些澳大利亚政商两界人士当时频频走访上海绝非偶然,而是从一个层面折射出两国之间快速增长的贸易往来。诸多前人学者指出,虽然两国迟至 1972 年才正式建交,但是澳大利亚的对华出口贸易总量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起就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扩大的趋势。^⑥

60 年代之后,澳对华出口贸易,特别是小麦贸易出现了进一步显著增长。意识到当时中国对于从澳购买小麦有着浓厚的兴趣,1961 年,澳大利亚小麦局总经理 C. J. 佩罗特(C. J. Perrott)在香港与华润公司进行业务洽谈时,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在华润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佩罗特于同年 3 月率代表团赴华,并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访问。^⑦ 对澳大利亚小麦局与中国方面在此期间展开的小麦贸易,澳大利亚政府同样是知情并且同意的。^⑧ 根据阿尔宾斯基的研究,澳大利亚的一些政客不但了解此时华润公司与澳大利亚小麦局正在进行的涉及小麦销售延期付款的谈判,并且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甚至还含蓄地流露出对这笔生意成交的欣喜之情。^⑨ 受中澳之间小麦、羊毛、钢铁等商品贸易快速增长的刺激,澳大利亚的银行业也开始寻求与中方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早在 1958 年,澳大利亚、苏格兰和澳大利亚银行(English, Scottish and Australian Bank)和澳大利亚联邦商业银行(Commonwealth Trading Bank)就曾分别派代表来华,并都访问过广东、北京和上海。^⑩ 1961 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的行长 H. C. 库姆斯(H. C. Coombs)鉴

① Sue Ebury, *The Many Lives of Kenneth Myer*, p. 419.

② “Australians to Investigate Chinese Trade,” *Canberra Times*, 17 March 1956. 关于 H. C. 孟席斯来华的具体时间还有另一种说法。《红色华润》中曾提到“1955 年初,澳大利亚驻港商务专员孟席斯来到华润公司,提出‘希望能够访问北京’……1955 年 3 月,孟席斯率领澳大利亚厂商代表团访问中国,澳大利亚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国的领土。”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吴学先撰稿)《红色华润》,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54 页。但除了上述记录之外,笔者尚未能找到其他足以佐证 H. C. 孟席斯曾于 1955 年来华进行过访问的相关材料,因此正文中仍取其于 1956 年来华一说。

③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pp. 182, 265.

④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 271.

⑤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外宾接待办公室关于对澳大利亚厂商在“地鲁士”轮展览工作的计划》,1958 年 12 月 3 日, B170-2-604-63,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⑥ 关于中澳建交前双方的贸易往来的情况,参见侯敏跃《中澳关系史》,第 163—167 页; 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pp. 12—13.

⑦ “Communist China Seeks ‘All Trade’,” *Canberra Times*, 2 August 1961. 《红色华润》,第 306 页。

⑧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 287.

⑨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289—290.

⑩ “China Buys Our Steel, Wool, and Wheat,” *Tribune*, 6 August 1958. “Increase in Trade with Red China Seen Likely Soon,” *Canberra Times*, 3 July 1958.

于中澳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快速增长的小麦生意,决定于该年10月赴华,以便与中国人民银行方面就相关业务问题进行交流。^①库姆斯在华期间曾向中方发出访澳的邀请,中方于次年6月派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领衔的三人代表团访澳。^②库姆斯在访华之前曾多次就其行程征求包括时任总理兼外长孟席斯在内的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的意见,之后又再次就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访澳一事向政府方面征询意见,但孟席斯政府并未对上述事项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进行干涉。^③从澳大利亚政府的行径不难看出,虽然其基于各种内外因素的考虑,坚持不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未就对华贸易形成一个清晰的政策,但这并不妨碍孟席斯等人在某些时候默许甚至私下鼓励对华的贸易。^④

最后还需提到的是,虽然在1972年前,中澳两国在官方层面上的实质性接触极少,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有一些当时在野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曾以个人或者代表团的形式来华交流,而上海则往往是他们热衷走访的城市之一。如1957年由四名议员组成、以莱斯利·海伦(Leslie Haylen)为团长的澳工党联邦议会代表团、1960年以工党议员身份来华的托马斯·尤伦(Thomas Uren)等,都曾在上海留下他们的足迹。^⑤

三 澳中民间交流幅度的扩大及其原因辨析

梳理1949—1965年来访申城的澳方人员的基本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当时两国的民间交流绝非仅限于少数对华抱有良好感的澳左翼人士,可以更加细化地分为以下七个类型:以艾尔贝斯为代表的青年和学生;以詹姆斯和莫罗为代表的和平运动人士;以蒙克和埃文斯为代表的工会人士;以巴顿为代表的妇女运动人士;以费子智、马尼福尔德和奥利芬特为代表的科学文艺界人士;以佩罗特为代表的商界人士以及以海伦等为代表的政界人士。

其次,从来访的目的和途径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除了少数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代表之外,绝大部分来华的澳方人士多是首先参加了于他国举行、由苏联主导的国际性会议或活动之后,以顺访的形式来到中国。他们的访华之旅,往往也有着声援中国人民发起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一目的。随着国际紧张局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缓和,许多1956年之后来访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选择直接经香港入境,且他们的访华之旅也多是抱着推动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或是促进双边贸易等现实目的。对于这一往来性质的变化,下文将做进一步延伸讨论。

其三,无论从来访人员的数量还是双方交流的广泛和密切程度而言,1956年都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从澳来沪的人员不但极少,而且往往局限于政治立场左倾的青年、学生以及和平运动人士。但在1956年之后,澳方来访人员的人数明显增加,政治立场和身份背景也更加多样化,其中既有左派的工会领导人,也有带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澳工党代表和文化、科学界以及少数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政商界人士等。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

①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273—274.

② “Red China Bank Man for Talks,” *Canberra Times*, 9 June 1962.

③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274—275.

④ 王毅认为,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并不反对与中国开展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背后有着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p. 16. 另外,对于台湾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开展的相应的游说活动的活动,部分澳大利亚学者已经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参见 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 49—50;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pp. 209—220.

⑤ 《澳工党议员访华团到京》,《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第5版。关于海伦在上海的见闻,可参见 Leslie Haylen, *Chinese Journey: the Republic Revisited*,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59, pp. 56—86. 关于中方接待尤伦的相关情况,参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关于接待澳大利亚和平代表团计划、活动日程、情况汇报、名单等》,1960年9月,C36-2-419,上海市档案馆藏。执政的自由党参议员南希·巴特菲尔德(Nancy Buttfield)也曾以个人名义来华进行过访问,但基于现有材料无法确认其是否曾经到过上海。“Lib. Praises China Progress,” *Tribune*, 22 April 1964.

首先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翟强曾指出,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尽管遭到了美国的百般阻挠和无理刁难,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展现的高超外交智慧,仍然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并为中国同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开展有限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理查德·凯西(Richard Casey)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对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的表现表示钦佩,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仍然坚持不与中国建交的立场。^②

二是澳大利亚政府将政治与贸易问题区别对待的做法,在客观上减少了两国民间人员往来的障碍。尽管地处远离欧洲和北美的太平洋一隅,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西方”国家,对当时英法等国的政商界精英频频访华以及由此催生的中西贸易的机会始终颇为关注。澳政府意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因此在5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放松其对国内试图访华的人士的旅行限制。在此之前,许多希望前来中国的澳大利亚公民由于澳政府拒绝发放护照而未能成行;另有一些因持有英国护照顺利抵华的人士,则在之后为他们的中国之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1952年来华的海伦·帕尔默在返澳后就未能获得澳教育部的聘任续约;1953年来华的伊丽莎白·瓦西列夫则由于违反了当时澳工党不允许其党员访华的禁令被开除出党。^③ 然而,阿尔宾斯基的研究发现,自1955年起至1964年,几乎每一个希望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人递交的护照申请都获得了批准。^④ 他认为,澳大利亚政府之所以会在此时转变立场,默许甚至在某些时候鼓励其国民以私人身份访华,绝不仅仅只是反映一种“自由”(Liberty)的信条,而是还有着“增进(与中国的)关系和获取信息”这一目的。^⑤ 或许也正是出于同一原因,孟席斯才会邀请英国前任首相和时任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在1954年访华之后,再赴澳大利亚进行访问。^⑥ 艾德礼的访澳之旅虽然并未能够推动澳大利亚政府改变其反华的立场,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工党的对华政策,并促使其在次年霍巴特(Hobart)会议召开之后转而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⑦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当时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涉及访华或者澳中关系的相关政策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市场的持续疲软、各国之间贸易竞争的加剧以及1955年之后西欧各国及加拿大对华贸易的激增,则是第三个推动澳中两国人员往来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澳大利亚工党、各大厂商、出口商、公众以及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才会不约而同地对发展中澳之间的非战略物资贸易持一种积极的态度。^⑧ 正如阿尔宾斯基所言,“(中澳之间的)贸易往来在1956—1957年的激增绝非偶

① 参见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The China Quarterly*, 129 (1992), pp. 121—122.

② 参见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p. 211; 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 25—26; David Walker, *Stranded Nation: White Australia in an Asian Region*, p. 210.

③ 当时以教师的身份访华的帕尔默,日后成为了澳大利亚著名的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并担任过左翼杂志《观点》(Outlook)的主编。关于帕尔默的生平简介参见 Robin Gollan “Palmer, Helen Gwynneth (1917—1979)”,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National Centre of Bi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adb.anu.edu.au/biography/palmer-helen-gwynneth-11333/text20237>, 2020年8月9日。瓦西列夫在其著作中提到因其希望参加1952年在京举行的亚太和平会议而被澳工党开除的经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显示,瓦西列夫最终未能参加此次亚太和平会议,尽管她仍在1952年底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之前,先行访问了中国,并在大会结束之后的返程途中,再次到访中国。Vassilieff, *Peking Moscow letters: about a four-months' journey, to and from Vienna, by way of Peopl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关于澳工党对于其党员试图参加这次会议的立场,另可参见“Peking Conference,” *Age*, 13 September 1952.

④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353—354.

⑤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370—372.

⑥ 当时随这支英工党代表团来华的成员中包括两名与中国渊源深厚的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林德塞(Michael Lindsay)和费子智。Patrick Wright, *Passport to Peking: A Very British Mission to Mao's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71; David Walker, *Stranded Nation: White Australia in an Asian Region*, p. 209.

⑦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183, 186—187.

⑧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 249—269.

然,因为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人开始访问中国以便对那里的市场机会进行考察”。^①

最后,1956年之后来华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人数的明显增长和身份背景的日渐多样化还与澳中协会(Australia-China Society)在推动两国民间交流方面所做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密不可分。由费子智和汉密尔顿·艾肯(Hamilton Aiken)等人于1951年建立的澳中协会,是一个以改善澳中两国关系、推动双方民间文化交流、增进彼此友谊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帕辛和侯敏跃等学者都提到,澳中协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通过举办各种与中国有关的活动如会议、讲座、电影放映、招待会、发放宣传单等,一方面促进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出呼吁,希望其尽早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②在这一中澳两国尚未正式建交的特殊时期,参与该协会的活动成为许多澳大利亚有识之士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如帕尔默、库萨克和马尼福尔德等知名人士都曾积极参加澳中协会组织的活动,或者本人即是该协会的会员。^③更为重要的是,澳工党中的一些实力派人士,也与澳中协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澳工党议员海伦在结束访华之行返回澳大利亚后,就参加过澳中协会组织的会议,并向众人分享其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④而另一名曾经造访上海的工党议员尤伦(后在惠特拉姆工党政府内任城市与区域发展部部长),不但曾多次公开表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尽早承认中国,还担任过澳中协会新南威尔士分会的副主席。^⑤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费子智率领的文化代表团于1956年首次访华之后,澳中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联系日渐密切,经双方友好协商,自1963年起,澳中协会便开始组织定期的自费旅游团赴华旅行,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澳中两国的民间交流。^⑥

结 语

作为一项以1949—1965年期间来访上海的澳大利亚人士为考察对象的实证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众多采自中澳双方的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辨析,初步厘清了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来沪交流访问的人员的身份背景、来访时间、途径和事由等一些基本情况。本文指出,同一时期造访过申城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可以被大致归为以下几类:青年/学生代表、妇女运动人士、科学文艺界人士、商界人士、工党政治家以及和平运动人士和工会人士。从这些来访者的社会背景来看,1956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来访的澳方人士主要是持左翼立场的青年、学生以及和平运动人士,而在1956年之后造访过申城的澳民间人士的背景则更为复杂多样。以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日内瓦协议》的签署为标志,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对抗的紧张国际局势缓和,澳大利亚政商两界在发展对华

①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 259.

② 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 358—359; 侯敏跃《中澳关系史》,第171—172页。根据澳方档案材料显示,早在1953年,澳中协会就已公开向澳政府发出呼吁,希望其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A): Central Office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6122, Subject files, multiple number series, 1949—; 1920,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New South Wales Volume 1, 1952—1955, 19—20.

③ NAA: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6122, Subject files, multiple number series, 1949—; 1920,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New South Wales Volume 1, 1952—1955, 93; Central Office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6122, Subject files, multiple number series, 1949—; 2003,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New South Wales Volume 10, 1963—1967, 105.

④ NAA: Central Office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6122, Subject files, multiple number series, 1949—; 1921,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New South Wales Volume 2, 1956—1958.

⑤ NAA: Central Office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6122, Subject files, multiple number series, 1949—; 2002,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New South Wales Volume 9, 1962—1967;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6122, Subject files, multiple number series, 1949—; 2003, Australia China Society, New South Wales Volume 10, 1963—1967. 关于尤伦这次的访华之行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他在返澳后为推动中澳关系正常化做出的努力,亦可参见其自传 Tom Uren, *Straight Left, Milsons Point*, N. S. W: Random House, Australia, 1995, pp. 117—118.

⑥ 参见《楚图南招待澳中协会旅行团》,《人民日报》1963年9月28日,第3版 “Australia - China National Body,” *Tribune*, 17 August 1960.

贸易这一问题上亦私下达成的共识,是促使澳中两国民间交流从之前服务于国际和平运动事业这一大的目标层面,逐渐延伸至贸易和文化等领域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在公开场合就对华问题所做的表态几乎从未偏离其一贯的口径,但总理孟席斯和其他政府官员基于发展对华出口贸易和情报收集等因素的考虑,私下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抱有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此外,澳中协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在深化两国人民彼此了解、加强交流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不应忽视,像澳中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为众多澳大利亚国内来自不同领域的亲华人士提供了一个发出声音的公共平台,以及与中方直接进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1965年,中澳两国之间虽然并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在民间层面仍然保持着有限的人员往来。在这16年时间里,特别是在1956年国际局势趋向短暂稳定之后,来自澳大利亚社会各个领域的民间人士曾经出于不同的目的造访过上海。受篇幅的限制,此处不便就部分访华人士在返澳后从事的诸多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活动展开具体的分析,对于这些自觉地或者下意识地扮演了中澳民间友好使者的澳方人士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以及他们在中澳建交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的具体角色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澳关系之所以能够在1972年柳暗花明,迎来转机,离不开这些民间“先行者”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长期不懈的努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建国初澳大利亚访华人士与中澳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CSS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杜 倩)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Jiangsu Society of Education in Period between Late Qing and May Fourth

XU Jia-gui

The present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in modern China. This was perfectly embodied in the power transition taking place within Jiangsu Society of Education (JSE) in the period between late Qing and May Fourth. Generally at the time organizations such as JSE was increasingly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but meanwhile they were still not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politics.

The Revolution of Image: Movie Show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Beijing, 1949—1956

DONG Jia and JIE Yi-lin

Movie plays quit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overning party's effort to create the public revolutionary thinking, new morality, and new concepts. Due to a series of work, cinemas gradually metamorphosized from entertainment venture to public educational space. In practice, movie not only met the people's need of amusement but also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revolutionary thought.

Sino-Australian Exchanges before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ustralians in Shanghai, 1949—1965

XIE Xiao-xiao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Australian visitors in Shanghai in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56, pointing out that this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 played a role in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1956 was a watershed. After that year, the number of Australians visiting Shanghai increased and the background of visitors was further diversified due to three positive factors.

Practice and Predicament of Factory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in Minor Third-Front

ZHOU Sheng-qi and XU You-wei

The present paper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minor third-front from 1966 to 1985, trying its best to, fair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ol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played in factories. It contends that there i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quality and yield in state-run factories and the mechanism of quality audit was limited in the planned economy.

Investigat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s Tenant Ri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N Xiao-jiao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tenant right could neither protect interests of landlord and farmer nor be adaptable to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British parliament's legalizing tenant right was an embodiment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the endeavor to optimize land, capital, and labor.

Nestling in between Rome and Geneva: William Stubbs' Elaboration of the Englishness of Anglican Church

CHEN Lei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intellectual threads of William Stubbs, who was not only one of